

东风西渐

——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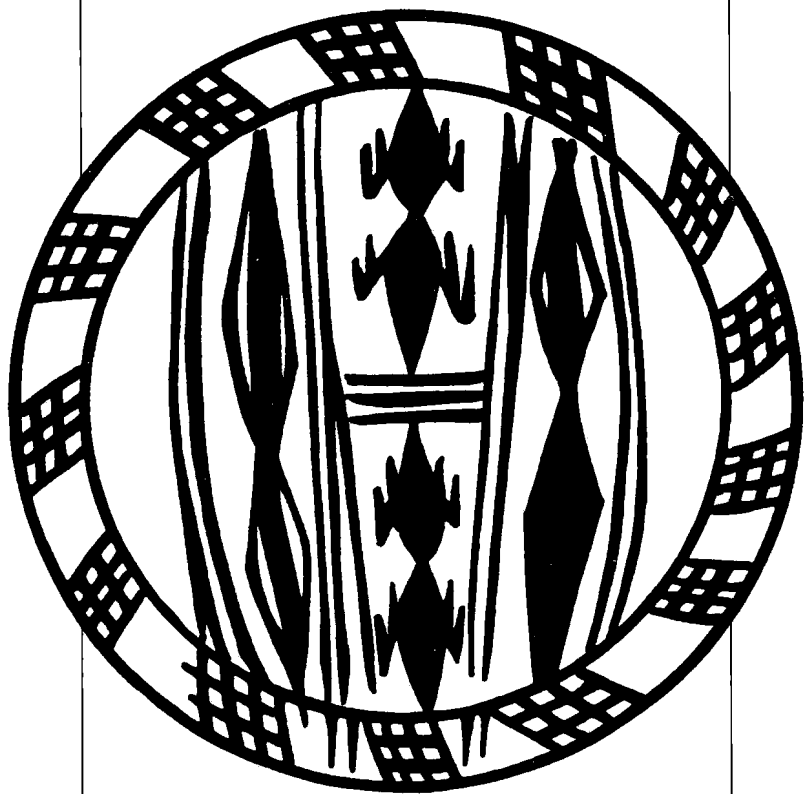
李水城 著

文物出版社

李水城 著

东风西渐

——
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杨新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 / 李水城 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10-2655-5

I. 东… II. 李… III. 远古文化-西北地区-文集
IV. K87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939 号

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

李水城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1 插页：1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655-5 定价：160.00 元

Prehistoric Cultural 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Li Shuiche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谨以此书献给

敬爱的老师李东涛（1927 ~ 1996 年）先生

前言

1996年5月13日，我敬爱的老师李东涛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不幸仙逝。自那以后，我一直以努力工作的方式纪念她。最近，《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这部文集即将出版，它一方面记录了我这些年来做的一点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即以文字的形式来纪念老师。

东涛先生祖籍广东梅县，父母为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她1927年出生在雅加达。新中国成立以后，1955年，她满腔热忱返回祖国，入河北师范学院俄语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东涛先生是我的俄文老师，也是我走入考古学的引路人，这话说来有点长。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从此两国边境摩擦不断，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防战争突发之不测，1970年4月，有关部门从西北地区各大厂矿抽调数百名青年工人和干部到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组建战备训练班，学习俄语和蒙古语，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已停课搞运动。我们入校以后，被告知是不穿军装的战士，开始过一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每个连配备有军人做教官（我们按连、排、班建制）。除学习外语，也学政治、军事，且不时参加劳动和训练。由于学员的教育背景参差不齐，不少人都是初次接触外语，学起来很吃力。李老师对所有学员都极富耐心，循循善诱，不辞辛劳，教学认真负责，得到同学们的普遍尊敬。

1970年冬，战备班的300名学员还组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野外战备拉练，每日背负行囊徒步行走，风餐露宿。晚上幸运的话可住在农民家里（有火炕享受），否则就住在学校教室或临时的什么地方，在地上铺点麦草、摊开行李休息。每天都要在黄土高原步行几十公里，一路尘土飞扬，红旗招展，人人走的汗流浹背，还要不停地轮流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大唱革命歌曲。偶尔还要别出心裁搞些急行军、防空、防化、防原子袭击的演习。中午就在野外吃点干粮，傍晚到达驻地才能吃上口热饭，蔬菜很少，生活很艰苦。那次拉练也有老师参加，但不记得东涛老师是否参与，她年纪大过我们不少，身体又不好，哪怕参加一段的话也非常之不易！

当时我年纪尚小，每天行军走路没问题，但野外走了一个月没洗澡，以至于拉练一

结束我便患了较重的皮肤病。后来去看中医，多亏东涛老师和她家里的老奶奶不辞辛劳为我每日煎药。那药难吃极了，每次喝下去都不住地干呕，东涛老师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服药前即为我备好一勺白糖，喝了药让我吃下去，这样要好过些。那时白糖定量供应，很珍贵，为此我很过意不去。亏得她们的悉心照顾，在服了五十几味药之后，我的皮肤病竟神奇般地痊愈了！

其实，早在我们战备班举办之前的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举行了一次会谈。此后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逐渐和缓，双方也都不想把事闹大，战争的可能性遂逐渐降低。到了1972年4月，除少数学员从军，大多数返回原工作单位。我也回到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机械化公司继续做电工。有时我会抽空去李老师家看望她、廖老师和老奶奶。

1977年11月的一天中午，下了班吃饭，从广播中得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当时听了并没当回事。过了几天觉得还是该试试。但手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时间也很紧，距离考试已不到一个月。最后还是到李老师家要到一本油印的小薄册子，里面有些简单的历史、地理和中文基础知识，印制极其粗糙，错误甚多，但当时就这条件。这以后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很快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对于能否录取并未抱什么希望。想不到我竟然被广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录取了（东涛老师的大女儿也考上了这所学校），同时又被告知，录取者还要参加一次口试兼面试，但时间未定，而且没地儿问。由于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一切都极不规范。我看着年关将至，思家心切，竟贸然估计年前不会考试了，脑子一热就买了车票回到四川。不想年初三接到电报，返回后得知口试竟在大年三十举行。因我不在，招生的人便找了另一位考生顶替。东涛先生则埋怨我不该在此重要关头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到处找不到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顶替！

我不甘心，遂给广州外国语学院打电报申诉，对方回了我一封密码电报。还是我所在公司的老经理（三八年的老干部）为我译的电文。大意是：招生名额已满，不能增加名额，望努力云云。这件事对我打击不小，可孤身一人找谁说理去，而且确实有本人的责任！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才知，当年北京有一批进入录取分数线的大龄考生未被录取，他们集体到市政府去静坐，后来全部以走读生名义招入了各大学。

事已至此，很无奈，遂请假回川，定下心来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高考。

1978年的高考据说是全国统一命题，我是先知道分数后报志愿，为此特意去找东涛老师咨询，她得知我历史考分甚高，遂建议我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被录取。东涛先生得知非常高兴，毕竟北京大学的名气要超过广州外国语学院。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一直与东涛先生通信，毕业时我被分到四川工作，三年后再返北大深造。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先生来信，说她和廖老师就住在北京的六铺炕一带，我急忙赶去看望，原来是他们的大女儿去了日本，老两口来女儿家小住。东涛老

师体质弱，且患过敏性哮喘，在兰州很难挨过空气严重污染的冬季。她对我说，北京的气候较好，希望退休后能来北京，但又恐怕大女儿出国不归，单位早晚要收回房子，遂问我可有办法在京买套房子，这个念头在当时可谓超前。此次见面分手后直至先生辞世，我们再未见面。

我这人打小自由散漫，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依照个人嗜好，我可能会选学生物或地质。前者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玩弄各类昆虫；后者是60年代深受话剧《年轻的一代》影响。但若按长辈意愿，也可能会学军事，因为父亲有位上司在一座军事院校当头儿，首长规定，男孩儿长大了都去军校。世事难料，到我小学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别说军校，就连中学都没上。

人的一生颇多偶然，但冥冥之中抑或隐含必然，说不清道不明。仔细想想，无论生物还是地质，都是注重实践的学科，而且都和考古学有点联系。比如说都要去野外考察、采集标本等。再往深了说（当然这也是我考入北京大学以后才知道的），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它们就分别来自地质学和生物学。

至今思想起来我仍会在心底默默地感念东涛老师！多亏她的指点，我得以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由此，我开始步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大西北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在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就不断有国外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进入中国的大西北探险、考察，也有些“丝绸之路上的魔鬼”很不光彩地盗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大西北也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最早涉足的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早年曾赴大西北进行考察、发掘，通过在西北的艰苦工作奠定了各自的学术地位。近年来，随着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拉大，西北考古颇有些被冷落，但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那里依旧是最具神秘感的考古圣地，也是考古学家最值得去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史》两门研究生课。选课者可任选一个领域的书籍、论文或报告，先在课下研读，再到课堂宣讲，大家共同参与讨论，先生最后点评，最后各自撰写出读书或研究报告。我当时选读的是瑞典学者安特生博士（J. G. Andersson）早年撰写的一些考古报告和书籍，包括《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史前中国之研究》等，并完成了两篇研究报告：一是《考古学发展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后来，前一篇被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一篇为我日后撰写博士论文奠定了部分资料基础（《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涉足西北史前一青铜时代考古，陆续撰写了一些文

章,内容涉及考古学史、区域考古学文化、彩陶艺术、冶金史、环境考古、农业史、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限于篇幅,本书遴选了其中部分论文,其空间范围覆盖了陇山东西两侧、河西走廊至新疆这条古老的丝路大道,也恰好切本书的标题。

我选择西北考古还有另一层缘由,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大环境在逐渐好转,但安特生仍在遭受批判。在我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书籍和研究报告后,觉得这位外国人是位真正的学者,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构功不可没。此人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1918年,他在周口店进行古生物调查时发现了打制石器,并敏感地预见当地埋藏有古人类化石,希望有人去努力寻找。正是在他倡议下促成了日后龙骨山的发掘,成为北京人发现的嚆矢。1921年,他先是到奉天(辽宁)锦西发掘了沙锅屯遗址;年底再赴河南渑池发掘仰韶村遗址,后一工作遂成为中国近现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但后来我们对这位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却有失公允,安特生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贩子,甚至有人谩骂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学者站出来为他做出客观的评价(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当时我也曾不解,总不能因为安特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就完全否定东西方之间存在接触和交流,特别是在中国大西北地区,那里地处东西交通要冲,自古即为多民族集聚之地,也是多元文化辐集和交互作用的敏感地区,应该有不少东西文化交流的线索有待于发掘。再说了,难道东西方的接触真的要晚到汉张骞凿空才开始吗?此前难道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正是带着上述疑问,我筹划赴西北河西走廊进行一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试图全面了解那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寻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蛛丝马迹。

1986年9~12月,我和水涛教授(现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前往河西走廊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野外调查,发现或复查了近50处史前遗址,收获颇丰。此后,我们还前往甘肃景泰、古浪、甘南(合作)及青海循化等地参与考古调查。1987年夏,我们俩又分别代表各自单位(水涛当时任职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酒泉干骨崖遗址,清理四坝文化墓葬105座,新发现数处重要的史前遗址。发掘结束后我们一道前往新疆,在乌鲁木齐观摩了哈密焉不拉克、哈密五堡、和静察吾呼山口等遗址的出土资料,对新疆的史前文化有了直观的感受。1990年夏,李非、水涛、莫多闻和我前往陇东渭河上游的葫芦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境考古调查,在秦安、庄浪、静宁、西吉、海原五县核查了516处遗址调查采集的实物资料,这也是中国学者独立进行区域考古调查的肇始(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古文化、古环境及其古气候情景的重建》,《中国气候与海面及其趋势和影响(1):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另见: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

古》1993年第9期；另见：莫多闻、李非、李水城、孔昭宸：《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第5卷第1期）。

经过长达五年的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的积累，大大深化了我对西北史前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给了我在该领域发表看法的机会，本书辑录的文章多半是在这期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按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为综述。收录的三篇文章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几点思考——〈师赵村与西山坪〉读后》和《新疆史前考古断想》。第一篇从纵向的视角回顾并总结了西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区域文化特征及需要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第二篇为《师赵村与西山坪》考古报告的读后感受，重申了我对西北史前考古的一些看法。后一篇是2008年8月在乌鲁木齐参加《新疆通史·史前卷》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表达了我对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基本认识。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讨论河西走廊地区史前一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的发展序列、文化编年及相互关系。其中，《四坝文化研究》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我在西部考古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四坝文化发现时间比较早（1948年），但长期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留，直至玉门火烧沟墓地发掘（1976年）以后才确认其属性为青铜时代，但也仅此而已。我通过对酒泉干骨崖、玉门火烧沟这两座墓地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并结合其他的调查发现，对该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分期的基础上确立了时空架构，深入讨论了文化源流、经济形态、社会性质、族属和人种等问题。其中，不少结论已被日后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围绕河西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四坝文化的研究，我陆续写了些文章。其中，《三下河西——河西史前考古调查发掘记》是在童明康先生《天上的神秘王国——古格王国遗址考察记》（《文物天地》1986年第1期）一文的启发下写就的。1985年他赴西藏阿里考察，十分艰苦，回来后我们曾畅谈良久，后来他写的这篇东西我很喜欢。为此撰文追记了我在河西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介绍了一些重要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目的是想从一个侧面展示考古学家的野外生活、科学的探索精神以及考古发现带给人们的愉悦和刺激，这也是我们当时曾向往有更多学者能积极参与的公众考古学普及作品。

《河西走廊新见马家窑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一文是探讨四坝文化源头的副产品。分布在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迁徙到河西走廊以后逐渐发生了嬗变，这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表现。1987年，我们在酒泉终于找到了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将该文化的分布向西推进了400公里，据此可推测该文化有向疏勒河流域扩散的可能。进入马厂文化以后，其变异速度加快，东西差异也更突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此文进一步确认“过渡类型”遗存是河西马厂文化变异的产物，并由此演变为四坝文化。上述认识完善了河西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也确立了带有中原文化基因的史前文化不断西渐的历史大趋势。

《公元前1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一文为庆祝宿白先生八秩华诞而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在安西（今瓜州市）兔葫芦遗址采集品中发现了典型的驺马式陶罐，表明该文化已进入疏勒河流域。但在该址也发现一批含陶鬲因素的遗存，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商末周初）。本文认为这两类遗存均不可能是四坝文化的后续，但上述发现填补了河西史前文化的阶段空白。

在走廊东部，20世纪50年代初在天祝县乌鞘岭北坡的董家台出土一组含红彩圜底罐的遗存，随即被归入沙井文化。我在《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此类遗存与洮河流域齐家文化的红彩圜底器风格接近，其分布范围东起陇山西侧、西抵河西走廊东端，其来源还是应该到齐家文化中去寻找，但其流向有可能分为两支，向西的一支影响到沙井文化；向东的一支则发展到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并成为先周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沙井文化研究》是我的另一篇代表作。自1924年安特生发现沙井文化后，有关该文化的研究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金昌等地发掘了一大批沙井文化墓葬。此后，我们也再次前往调查。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对沙井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深入讨论了该文化的分期、年代、分布、文化源流及其族属。并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河西走廊东北部的古生态环境及沙井文化可能的经济形态等问题。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西北及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刘家文化来源的新线索》是《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的姊妹篇。此文是在1990年葫芦河流域环境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实地考察看到的新资料，我发现活跃在陇山左近的董家台类型与宝鸡地区以晁峪—石嘴头类型为代表的遗存之间有文化渊源关系，并最终通过扶风刘家墓地为代表的姜戎部落融入到姬周文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掘资料的披露，一种在器表堆塑细泥条附加堆纹的蛇纹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此类遗存的来源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我倾向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考察这一文化特质。联想到陇山东西、河西走廊等地也曾发现过蛇纹器，我将长城沿线分为四区，分别考察了各地蛇纹器的年代和特征，继而对此类因素的源流和时空变化作了分析。基于对“鬲”这种文化特质的理解，我不认为蛇纹器是外来因素，而是华夏文明向遥远的北方森林辐射传播的历史见证。

《华夏边缘与文化互动：以长城沿线西段的陶鬲为例》是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多元互动”会议而作。鬲是华夏文明特有的器物，在中华远古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透过对长城地带西段鬲的发生和演变，追寻中原向西北施加文化影响的轨迹，这一过程表现为中原首先作用于陇东，既而扩散影响到河湟地区、河西走廊。其影响力度表现为自东而西、逐步弱化的趋

势。另一方面，鬲这种造型复杂的器皿历来被认为与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考虑到西北地区自齐家文化以降，鬲的使用也逐渐式微，显然这一变化与西北地区随气候波动和环境改变导致农业向畜牧业经济倾斜，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有着某种关联。

《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一文是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际汉学大会而作。本文通过对西北史前诸考古学文化的梳理，特别是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捕捉到的蛛丝马迹，窥见西北地区史前文化自东而西、渐次扩散的历史大趋势。约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至此，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了碰撞并出现融合。此后，东西方之间的交互愈演愈烈，并最终促成一条连接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诞生，这显然是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这部分还收录了两篇涉及新疆东部考古的文章。《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是为纪念俞伟超先生而做。此文对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林雅墓地）一期遗存作了深入分析，指出这期遗存包含了三组不同性质的遗留，其中两组来自哈密以东的河西走廊，即马厂文化晚期的“过渡类型”和“四坝文化”早期遗存；第三组以筒形贯耳罐为代表，它或许为当地土著，但更有可能是从新疆西北部阿勒泰草原南下的外来因素。这三组因素年代有先后，反映出新疆东部地区早期文化的构成。《洋海墓地新见文物引出的问题》讨论了前两年从盗墓贼手中收缴的一件马鞍口双耳罐，这是件寺洼文化的典型器，假若真是出自洋海墓地，其背后隐藏的故事很值得深究。

第四部分是冶金史研究。主要探讨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四坝文化铜器研究》一文全面介绍了四坝文化新出土的铜器种类、工艺特征及合金成分等，特别是对该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特征以及与中亚等地的联系等作了深入阐发，认为四坝文化的冶金术可能与中亚、小亚和近东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冶炼砷铜的“合金试验期”。鉴于在新疆尚未发现公元前二千纪以远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尚难确认四坝文化的砷铜来自新疆以外的地区。考虑到四坝文化恰好分布在中原与中亚之间，而且我国西部又是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故加强对这一区域冶金考古的研究不仅显得重要，而且有特殊的意义。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是对我国早期冶金术的全面总结。本文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各区域的阶段性特征；2）早期冶铜业的不同工艺传统及其演进趋势；3）东西方早期冶铜术的传播与互动。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境内的“早期铜器”（公元前3000～前1500年）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西北（甘肃、青海和新疆），另一是中原（晋南和豫西）。前者以小件武器、工具和装饰品为特征，长期使用石范和锻造技术。在合金工艺上，河西走廊—新疆表现为红

铜—砷铜—锡青铜；河湟地区为红铜—锡青铜。后者从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早期也以小件工具、武器为主，但装饰品稀少；合金则从红铜发展到锡青铜；约当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出现了泥范工艺。上述差异很可能与各自所在区域的资源、经济、文化传统及东西方的交互作用有关。约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中国境内已形成了河西走廊—新疆、河湟地区、中原三个各具特色的金属制造中心。鉴于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毗邻，比较早地与外界发生了联系，有可能将进步的冶金术引入河湟地区，进而间接影响到中原内地。进入公元前三千纪以后，随着西北与中原交往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刺激了二里头文化的冶金术，加之华夏文明具有的强大文化吸附能力，最终导致具有黄河文明特色的冶金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形成，并为日后商周发达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本文集的基本内容。其中，除某些局部的空白还需要填补外，大致勾勒出了我国西北、特别是陇山左近、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史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不断向西扩张影响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引发的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代表了我对中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基本认识。难免有些不足之处，希望能得到前辈和同仁的悉心指正。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和《公元前 1 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这两篇文章是我与老同学水涛教授合作完成、联名发表的，此次承蒙他的同意收入本书，也是对我们那段亲密合作的记录和纪念！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以及在西北考古调查发掘期间，先后得到老师苏秉琦、宿白、严文明、俞伟超、张忠培、张学正、岳邦湖等先生的指教和关爱，在此特向各位先生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1986~1990 年，我多次前往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得到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所诸多友人在业务和生活上的大力关照；在甘肃河西走廊调查期间，得到各地县市基层文物部门的积极配合；在酒泉发掘期间得到市博物馆同仁的支持和帮助；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只能再次向各位表达特别的谢意！

2009 年初夏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目 录

前言	(5)
----------	-----

综 述

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1)
中国西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几点思考——《师赵村与西山坪》读后	(26)
新疆史前考古断想	(32)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

三下河西——河西史前考古调查发掘记	(34)
河西地区新见马家窑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	(40)
四坝文化研究	(58)
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	(106)
公元前 1 千纪的河西走廊西部	(115)
沙井文化研究	(128)

区域文化互动

刘家文化来源的新线索	(154)
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	(164)
华夏边缘与文化互动：以长城沿线西段的陶鬲为例	(176)
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200)
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	(219)
洋海墓地新见文物引出的问题	(229)

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起源与发展

四坝文化铜器研究	(232)
----------------	-------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	(246)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20)

Contents

Introduction	(5)
--------------------	-----

Synthetic Research

A Review of the Neolithic of Northwest China	(1)
Some Thoughts on the Pre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 Comments on the <i>Shizhaocun</i> and <i>Xishanping</i> Report	(26)
The Some Thinking about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Xinjiang	(32)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the Hexi Corridor

Records from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Survey and Excavation in Hexi	(34)
New Evidence of the Majiayao Culture and Related Evidence from the Hexi Corridor	(40)
Research on the Siba Culture	(58)
The Dongjiatai Culture-Variety and Related Issues	(106)
The Western Hexi Corridor in the 1st Millennium BC	(115)
Research on the Shajing Culture	(128)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North China

New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the Liujia Culture	(154)
A Study of the Pottery with Snake-shaped Appliqué in North China	(164)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Marginal Regions of Hua Xia Culture; A Case Study on the Pottery <i>Li</i> along the Western Area of the Great Wall	(176)
East -West 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 in the 2nd Millennium BC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200)
A Study of Phase I of the Tianshanbeilu Cemetery in Hami	(219)

Issues Related to Recently Confiscated Antiquities from the Yanghai Cemetery in Turfan	(229)
---	---------

The Origin and Develop of Metallurgy in Northwest of China

Research on the Bronzes of the Siba Culture	(232)
---	---------

Early Metallurgy Variabil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	(246)
---	---------

Bibliology	(294)
------------------	---------

Epilogue	(320)
----------------	---------